

## 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学思想探析

吕红霞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隐蔽的人学逻辑加以拓展和深化,形成了“综合性的人学观”。这种“综合性的人学观”以马克思的“社会性的人”的理论为其基本底色,对以人的意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人学进行了批判和补充,深入探讨了潜意识在人的行为和社会文明中的功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社会的学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革命新理论”。此外,哈贝马斯将传统人学所理解的个人的凝固不变的“自然理性”的本质,创造性地转化个体之间所共有的“交往理性”,并赋予人学理论更为具体的内容。

**【关键词】** “综合性的人学观”;“社会性的人”;爱欲;交往理性

**【中图分类号】**B08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3)10-0014-05 **【收稿日期】** 2013-07-11

**【作者简介】** 吕红霞,女,山西临汾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人学思想。在早期,尽管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没有发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人就在列宁开拓的理论道路上,从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入手,着重夸大列宁在革命策略上“主体能动性”的灵活性,强调“阶级意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由此他们“不约而同地从‘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入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中重新揭示了一种以主体能动性为核心的价值批判逻辑。”<sup>[1]</sup>此时人学思想隐藏在革命策略和哲学逻辑之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人学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话语。继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将这种人学逻辑加以拓展和深化,形成了“综合性的人学观”,这种新型人学观“不仅拓展了人学的内涵与外延,而且开启了一种复合型的人学批判向度,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更为广阔和深厚的规范基础。”<sup>[2]</sup>

这种“综合性的人学观”不同于传统人本主义(古典人本主义)哲学从抽象的“类本质”来确证人的存在,在人的理智和经验之间制造分裂,也不同于新人本主义的孤立化的个人主义视野,而是力图追随马克思“社会性的人”的观念,从社会和历史出发审视人的存在境遇。古典人本主义哲学的提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展开是同步的,它是建立在早期工业文明基础上的一种近代思潮。“古典人本主义是一种理性人学观,它的理论建构主要有以下三个环节:一是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观念的确立;二是人对自己地位的理性确证;三是‘类’人学的理论证明。这三个环节是一个逻辑递升的过程,共同构成了近代人学观的核心内容。”<sup>[3]</sup>古典人本主义哲学为西方现代性确立了主体性的基本原则,并将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看作现代性的思想根基。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挟持着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旗帜的启蒙,并没有使得人类摆脱恐惧,树立自主,而是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沦为彻底的非理性和野蛮状态。所以,批判理论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审视人自身,重建理性的统一性,将启蒙所未竟的事业继续推进。在此基础上,霍克海默首先批判了古典人本主义哲学“抽象

的人”的形象。他认为：“抽象的人似乎可以消除潜伏在经济奇迹背后的恶，承认这种抽象的人的存在既像是引证又像是抚慰。撇开生活水平和期望值的提高不谈，存在正变得愈加困难和危险，源于不公和这种复杂存在的生理痛苦常被搪塞过去，把它归因于重要的是个性这种深刻的洞识。”<sup>[4]</sup>而这样一个个体的出现必将是一群这种个体出现的征兆。所以，要摒弃对人的抽象化理解，就要从人的存在本身入手。霍克海默认为，在晚近的欧洲，存在主义这种关于具体存在的哲学的兴起得益于在反思过程中对人的深刻洞察。所以，在存在哲学关于人的“存在”的思想启迪之下，法兰克福学派更为关注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及其意义。在《人的概念》一文中，霍克海默透过概念的迷雾，将人放在经验领域加以描述，揭示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职业之间、城乡之间、工作和闲暇之间、儿童和青年之间、男女之间彼此相像而最终导致的人的原子化和孤独的存在状态。

与古典人本主义哲学相比，新人本主义哲学是建立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一种现代思潮，它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不再从“类意识”出发确证理性，而是从个人的生存体验出发颠覆传统人本主义哲学。尽管内部存在差异性，但是，“他们试图在当下破碎的生活经验之中来弥合自我，由于他们执着于‘生命—肉体—意志’，他们的探索带上了浓厚的行动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因此，一种实用主义的努力把人的类本质消融为个体的感性经验活动，它使人本主义入世还俗，直接外化为一种生活效用和抽象的价值肯定。”<sup>[5]</sup>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吸收了新人本主义的观点。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摒弃了启蒙哲学对人的主体性解释，他们认为，人并非是有着自由意志的理性而神圣的主体，他们吸收了尼采的思想，将人看做是来自于大自然，被不由自主的“力”所驱动的存在物。他们指出：“尼采本人，就是自黑格尔以来能够认识到启蒙辩证法的少数思想家之一。正是尼采，揭示了启蒙与统治之间的矛盾关系。”<sup>[6]</sup>作为“力”的载体的人，在经验世界通过自我持存，以达到对自然和他者的主宰；在观念世界中，通过自我确证，确立了同一性的统治逻辑。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认同晚近欧洲兴起的新人本主义思潮对人的问题的深刻反思，但是，学派成员普遍反对新人本主义孤立化的个人主义视野和对人的本质的否定。霍克海默指出，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渊博但模糊，他的思想和流行的观念——人会拯救我们——同样都忽视了真正的总体性及其非正义性，忽视了社会和个体之间公开的、隐蔽的、多样化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而集中注意现实希望的象征。”<sup>[7]</sup>所以，霍克海默指出，在关于人的问题上，我们需要与大哲学家交流，还需要神学传统知识。大哲学家，以黑格尔为例，告诉我们，孤立的存在只能是迷信；神学传统蕴含着人类对自由和希望的把握。因此，“只有作为所属整体的一部分，个体才是真实的。个体的本质规定、性格爱好、业余嗜好和世界观等都源于社会及其社会命运。”<sup>[8]</sup>作为个体的实质内涵的本质，不存在于个人行为中，而是存在于整体生活中，只有在民族、国家中才能实现。本质的作用属于道德秩序的观念和世界的概念，所以，在此意义上说：“康德的道德自由先决条件的绝对性在霍克海默的思想中和犹太人的原初动机中，即对世界上的不公正的正当愤怒，发生了共鸣，这种正当愤怒就是‘痛苦的悲怆’（保罗·科利尔语），它和马克思的重要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伦理认识是有联系的。”<sup>[9]</sup>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学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性的人”的观念，是对古典人本主义哲学和新人本主义哲学的双重扬弃。张一兵等认为，新人本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底色，随着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在整个现代西方学术语境中已经成为重要力量的新人本主义（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尼采和早期海德格尔），迅速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生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观念，早期的列斐伏尔、弗洛姆、马尔库塞、布洛赫和晚期萨特，无一例外地高擎着人学的旗帜，在他们的眼中，马克思主义就是人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对布尔乔亚世界的人学抗议。”<sup>[10]</sup>这种解释存在着对法兰克福学派人学思想的误读，因为马克思“社会性的人”的理论才是其基本的底色。

## 二

法兰克福学派还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以人的意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人学进行了批判和补充,深入探讨了潜意识在人的行为和社会文明中的功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社会的学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革命新理论”。传统的人学理论是在意识哲学的理论范式基础上建构的。西方哲学史中严格意义的意识哲学形成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我思”是以意识活动为对象的自我意识,“我思”与“我在”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本质和实体之间的必然联系,即从自我的思想活动,我们可以得到自我必然存在的结论。“我思故我在”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近代哲学确立了反思性、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等基本特征,也为现代性确立了自我言说、自我立法的基点。

由笛卡尔开创的意识哲学经由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经历了一个完善的过程。“我思”所指涉的一切意识活动,在康德哲学中被限定为“知性”的思维活动和思维能力。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部分(客观演绎)对“我思”作了精致地分析。通过对“知性”作用的分析,康德进一步凸显了主观能动性,将笛卡尔开创的人本主义的精神发扬光大,建构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黑格尔批判了康德抽象、孤立地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的作法,他用历史理性取代了抽象的普遍理性,因而突破了近代认识论只研究个人意识的局限性,把劳动、实践、历史、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等引入知识发生过程。但是,黑格尔的意识哲学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所以,哈贝马斯指出:“自笛卡尔以来,自我意识,即认知主体与自身的关系,提供了一把打开我们对于对象的内在绝对想象领域的钥匙。因此,形而上学思想在德国唯心论那里表现为主体性理论。自我意识不是作为先验能力的本源被放到一个基础的位置上,就是作为精神本身被提高到绝对的高度。观念本质变成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理性的规定范围,以至于现在在真正的反思转向过程中一切都和这个独一无二的创造主体性发生了关系。”<sup>[11]</sup>

在上述意识哲学范式的影响下,人被看做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而神圣的主体,人及其理性本身是自足的。与意识相关的心灵内部活动(情感、欲望、想象力等非理性因素),则要么被看作是错误的来源,要么被看作知性的构成部分。马克思的哲学是从批判意识哲学的绝对形式,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出发的。他从根本上扭转了意识哲学的研究方向,将哲学的出发点理解为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人首先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观念性的存在。所以,哲学的任务应该是改变不正当的现实世界,创造一个属人的世界,而不是从意识出发解释世界。

与此同时,新人本主义从人的存在状态、生命意义等个人的生存体验出发也开启了对意识哲学的批判。其中,赋予新人本主义以科学意义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将人的精神生活的潜意识看作是左右人的根本力量,这一点对意识哲学关于“人是理性的动物”观点的批判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不同于新人本主义对古典人本主义理性传统的彻底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将潜意识看作是对意识的一种限定,他的研究目的旨在通过对人的无意识状态的分析、揭示,从而消除无意识状态,所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还是属于理性主义的传统,是对意识哲学的补充。在法兰克福学派“跨学科研究方法”中,最核心的就是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引入批判理论,这也是学派成员力图挣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紧身衣的标志。在他们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缺乏对人的观念过程与物质过程之间复杂关系的说明,而精神分析理论则能够提供二者之间失去的连结。弗洛姆试图通过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更新关于人的本性的唯物主义观念,同时将精神分析与伦理学结合起来,以建立一种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构建“自为的人”的新形象。在20世纪40年代,随着研究所成员对革命可能性不断增长的悲观主义情绪,马尔库塞则试图拯救被学派成员忽略的“革命的弗洛伊德”,构建了“爱欲人”理论,以唤醒革命主体的激情。

弗洛姆是在远离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的正统理论基础上,调和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在《逃避自由》中,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人的生存条件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人从自然和原始纽带中分离出来,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个体,要么他要通过爱的本性和生产性的工作建立起和世界的联系;要

么放弃他作为个体的自由和完整,恢复和世界的联系以获得安全。弗洛姆认为,后者驱使人逃避自由,所以他的努力在于乐观的道德改良。因此,在《逃避自由》的续篇《自为的人》一书中,弗洛姆将心理学与伦理学结合起来,通过将人性的理解与对人的生活价值和规范的认识结合起来。由此,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被转化成了道德改良的新话语。

相比较弗洛姆对马克思主义公开的人本主义化,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化是隐蔽和复杂的。对于马尔库塞而言,弗洛伊德使他坚定了革命的乌托邦方面。《爱欲与文明》这本复杂又丰富的书远远超过了此前批判理论试调和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的努力。详尽探讨本书的内容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但该书关于人的论述却值得注意。马尔库塞谴责弗洛姆将关注点从潜意识转向意识、从生物学转向文化因素,在他的理论中没有超越现存制度的概念基础。而马尔库塞则从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出发,将本能层次观念确立为一种独立的批判标准,并以此来评判社会并探讨如何塑造个人,于是属于无意识的生命本能被看做更能够体现人的本质,而这种生命本能就是爱欲,所以,人的解放根本上就是爱欲的解放。在此,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被转化成爱欲解放的乌托邦话语。

总之,尽管弗洛姆和马尔库塞在对待弗洛伊德正统理论的态度,在将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方面存在着分歧,但从根本上看,他们提出的道德改良和爱欲解放的革命新理论其实是在寻求一种本质上是健全的、快乐的人的存在新路径、新形式,他们将意识哲学中抽象的人性与伦理、本能等问题结合起来考察,建构了人的新形象,所以这不仅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更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本体论。因而,他们的人学思想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逻辑上的重要一环。

### 三

早期批判理论家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出发对意识哲学进行了第一轮批判。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定理被心理学的最新发展否定之后,哈贝马斯创造性吸收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语言哲学、解释学等最新成果,将传统人学所理解的个人的凝固不变的“自然理性”的本质,创造性地转化个体之间所共有的“交往理性”,并赋予人学理论更为具体的内容。

如前文所述,传统意识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达到顶点。与此同时,它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人本主义的激进解构。而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则试图为传统的意识哲学打开一片新天地,从而摆脱主体意识哲学的困境。他的意识现象学从根本上符合传统意识哲学关于主体与对象世界关系的讨论主题,但是,他又力图通过转向交互主体和生活世界,而摒弃传统意识哲学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体。不过,在胡塞尔的哲学中,交互主体的提出不过是对先验纯粹主体的补充和修正,并不具有核心地位,他是摆脱了“唯我论”的先验的交互主体,即在每一个先验纯粹的本我中包含着他人。生活世界也不过是通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因为,与人有关的生活世界仅仅作为先验分析的出发点,一旦进入先验哲学的领域之中,生活世界就立即遭到排斥。

哈贝马斯从外部对胡塞尔的先验交互主体和生活世界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借鉴。在哈贝马斯看来,交互主体性或者交往理性是独立的、自在的范畴,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而且,交往理性体现在日常交往和语言符号当中,既不是先验的东西,也不隶属于某个个体。而对于理解者而言,“生活世界构成一个视域,同时预先提供了文化自明性,由此,交往参与者在解释过程中可以获得共识的解释模式。价值共同体的团结以及社会化个体的能力,同文化上根深蒂固的背景假设一样,都属于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sup>[12]</sup>这两个概念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在这里,“理性表现在交往行为中,并与各种自称总体性的传统、社会实践以及切身的复杂经验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其中介包括文化的自我理解、通过直觉而呈现出来的集体团结以及社会化个体的认知潜能等。仅仅以复数形式出现的特殊的生活方式,无疑并非只是通过家族相似性的网络而建立起相互联系,它们展示出了一切生活世界的共同结构。”<sup>[13]</sup>在此,哈贝马斯摆脱了工具理性批判的理

论困境,展示了诸种社会行为合理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到交往理性范式的转变,哈贝马斯试图开辟一条走出意识哲学的途径,从而再一次释放理性的潜能,确立现代性的规范内容。

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交往理性的提出不仅仅针对意识哲学,而且针对工具理性批判思想。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是交往理性这个全方位理性概念的一个内在向度。它体现了交往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态度。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弊病,问题不在于工具理性本身,而在于工具理性的越界,它脱离交往理性,而取得了支配地位,因而,关键不在于否定工具理性,而是要限定其使用的范围,这正像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对人的理性所做的限定。所以,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平等互信的交往和沟通才是更为深远和高尚的人本主义。在交往理论基础上,哈贝马斯后期通过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开创了一种话语政治理论,试图赋予交往理论以可行性和操作性。

经过哈贝马斯的话语转换,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经过了一次创造性提升。在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哲学中凸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立场再次返回幕后,成为一种人本主义的价值诉求。同时,经过了对意识哲学的两次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学立场既克服了传统人学的形而上学性,也对革命的乌托邦理论进行了纠正,将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置于新的理性基础之上,从而为批判理论确立了规范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综合性的人学观”的确立既与其学派成员众多有关,也与学派成员对既有理论资源的批判性整合密切相关。马克思“社会性的人”的理论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主体能动性的强调,叔本华和尼采等开创的新人本主义思潮,韦伯的合理性和理性分化的思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语言哲学的最新成果等多个异质性话语都被有效地整合到其人学思想当中。因而,这种“综合性的人学观”兼具批判和建构的双重维度,它深化和拓展了人学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也开启了一种复合型的人学批判维度。法兰克福学派这种兼具批判和建构双重维度的“综合性的人学观”对于当代中国现代性人学立场的确立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 参考文献

- [1][5][10]张一兵,夏凡.人的解放[M].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39,141,4.  
[2]丰子义,郗戈.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J].学习与探索,2009(02).  
[3]仰海峰.世纪之交的人学逻辑转换——从古典人本主义到新人本主义[J].江海学刊,1998(05).  
[4][7][8]霍克海默集——文明批判[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232,232,235.  
[6]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5.  
[9]H.贡尼,R.林古特.霍克海默传[M].商务印书馆,1999:30.  
[11][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译林出版社,2012:31.  
[12][13][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译林出版社,2004:349,379.

[责任编辑:贺永来]